

十一、中文版补记

现趁本书中文版行将刊行之际，特将 1961 年后日本经济的变化情况，简单地补记如下，以供中国读者参考。

1. “岩户景气”的挫折及其对策

据日本政府计算，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执行的第一年即 1961 年，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实际增长率(亦称经济增长率)为 14.5%，比 1960 年 13.3% 的增长率更高了。正如白皮书中所说，这是私人设备投资在一年之内扩大 38% 所发生的巨大影响。但是，经济的急剧膨胀又迅速地成为爆发巨大矛盾的原因。这是因为景气过热势必导致进口激增(出口增长微弱)，于是国际收支恶化、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从而紧缩银根，造成了景气的恶化。按照这个公式，日本经济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在 1962 年降为 7.0%，很多产业部门陷入生产过剩，其中钢铁工业的困难最大。这是因为钢铁部门在当时过大地扩充规模，因而生产大量过剩。于是首先向美国、其次是向东南亚等地强行输出其大量过剩的产品，美国是世界上以钢铁为主的各种商品的巨大市场。此后，日本对美国的出口攻势从未减弱。尤其是当日本国内发生经济危机时，这种情况更为突出。不仅如此，为了使钢铁工业摆脱困境，日本中央银行还通过商业银行特为这个部门的各主要公司提供巨额的救济贷款。

由于景气恶化、生产过剩，日本在 1962 年便减少进口，急剧增加出口(包括“亏本出口”)，于是国际收支好转，外汇储备也转而增加。但是景气依然停滞，许多部门持续处于生产过剩和商品价格

下跌的状态。一度呈现繁荣景象的股票市场，也爆发了过剩的危机，因而股价暴跌，证券部门的景气恶化特别深刻。

府政为使景气回升，实行了低利率政策和扩大信贷的方针，从1962年9月起连续降低中央银行贴现率，并且大幅度增加财政投资。1964年，乘东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机，日本中央及有关地方政府，都积极增加公共事业投资、建设东海道新干线、名神高速公路（名古屋到神户间）、首都高速公路、奥林匹克比赛设施以及与奥林匹克有关的公路建筑等。所有这些，都是摆脱危机的对策。

2. 经济危机的到来

上述各种对策，虽然使经济暂时恢复或维持下来，但回升并未真正到来，而且在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后，景气反而加速地走向恶化。故从1964年3月开始，又重新采取紧缩银根的政策，到这年年中，企业破产和合并的现象又急剧增加，从1964年末到1965年初，甚至发生大型企业连续破产的问题。

股票市场价格暴跌，在1964年更加激化。政府以及金融机关虽然采取了种种对策，但是并无效果。1965年5月，东京和大阪各有一家有实力的证券公司陷入破产的边缘。如果对此置之不理，则其它许多证券公司也将被卷进来，破产的范围一定要扩大，而且一定要波及金融机关，这就势必要面临一场深刻的金融危机。为了回避这场危机，大藏省与日本中央银行遂紧急决定，由中央银行通过商业银行对上述两家证券公司提供无担保救济贷款。这样，这两家公司才免于破产，而金融和信贷危机也未爆发。

当这场危机快接近尾声时，1965年7月新上任的福田藏相采取了一系列摆脱危机的对策，其要点是：（1）发行赤字公债（1949年道奇路线以来，十六年没有发行公债）；（2）减税（主要对企业减税）；（3）增加财政投资贷款，等。这些对策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使

危机很快到底，然后从当年的下半年开始，经济恢复稳定，景气逐渐回升。

从1961年到1965年间，值得注意的其他几个事件是：1961年制订了农业基本法，1964年又仿照该法制订了中小企业基本法。1964年也是日本由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十四条国变为第八条国的一年。从这年开始，如果没有IMF的承认，日本不得限制对外支付以及同外国之间的资金移动。也是在1964年里，日本加入了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叫做“发达国家俱乐部”），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员。

3. 景气再次回升与经济高速增长的重现

六十年代前半期，当经济的高速增长出现暂时的挫折时，在日本出现了一种“转变论”的主张。这种主张认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结束，从此以后要降低增长速度，同时，在经济增长中一直充当主力的设备投资，也要由私人消费和政府开支来替代了，并且认为这种“转变”乃是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必然趋势。围绕这一主张，掀起了一场争论。尽管议论很多，但从后来数年间的实际经过来看，所谓的“转变论”与实际情况出入很大。

也许是福田藏相的危机对策发生了效果，到1965年底，景气出现回升的兆头，从1966年末开始，景气已明显地趋于好转，进入1968年时，真正的繁荣状态已经出现。从1966年到1970年，日本经济连续五年都是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其中以1968年为最高，达14%，这个增长率与高速增长初期最繁荣阶段的1961年相同。1961年以来的七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实际翻了一番。这样高的增长速度，几乎是谁也预料不到的。

这种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直接的原因可以说主要是私人设备投资和出口贸易大量增加的结果。以私人设备投资来说，在

1965年危机时虽然比上一年下降了6%，但从第二年开始转入增加以后，连续三年（1967、1968、1969年）分别以27%、27%和22%的高速增长。这三年私人企业设备投资的实际总额为“岩户景气”三年（1960—1962年）实际总额的一倍半。

与此同时，出口贸易在1968年增长了24%后，也连续三年以21—24%的高速增长。在这以前，不论是“神武景气”（1956—1957年）还是“岩户景气”时期，都是经济繁荣时国内需求大幅度增加，而出口则反而不振；在危机和萧条时期则是国内需求不振和出口增加，出现向国外大量抛售过剩产品的情况。但是从六十年代的后半期开始，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不论经济好坏，出口都不断扩大。只有1975年和1979年这两年例外，其余年份的出口贸易大致每年都是以20%的速度持续增长（1974年的增长率是更为罕见的50%）。这是因为日本积极地发展工业，国内市场大部分已经难以继续依赖，因而不得不扩大国外市场的结果。日本的主要工业公司几乎都是从这时开始致力于出口贸易的。日本在1964年加入OECD时，便大力提倡经济“国际化”的主张，而“国际化”的真正实现则是在六十年代的末期。不仅是扩大商品出口，连资本输出或者企业本身向海外迁移，也是在六十年代后半期特别是从1968年起出现了急剧增加的趋势。进入七十年代后，这种攻势更加凌厉。资本输出虽然是对着世界的许多地区，但主要是面向东南亚各国和美国的。对于美国来说，为了避免其失业人口的增加，多数意见认为，如其让日本的商品进来，还不如让它的资本进来。但是东南亚地区，却把日本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视为“经济侵略”而加以警惕。正是因为这个缘故，1974年1月，日本的田中首相在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的首都访问时，有过亲自领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大示威的痛苦经历。

无论如何，日本在六十年代后半期，毕竟取得了远远超过其它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西德，仅次于美国而居“自由各国”的第二位。1966年以后的五年期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为12.1%，美国、西德、法国和英国则仅仅分别为3.1%、4.7%、5.8%和2.2%。

大体到六十年代后半期，随着垄断资本的急剧发展，日本经济出现了若干值得特别注意的事态。其一是大公司之间的合并现象相继出现。例如三菱重工(1964年)和新日本制铁(1970年)的成立，以及日产汽车公司与王子汽车公司的合并(1967年)等等，都是美国占领时期已经被解散的公司的复活与合并。

其二是资本的自由化问题。日本为保护国内工业，防止外国企业的竞争，对外国企业的迁入国内从来是严加限制的。尽管外国特别是美国对此表示反对，但日本政府对它们的要求多半不予批准或者长期予以搁置。然而后来，由于垄断资本的力量急剧增强，感到对于外国有力企业的迁入已不必那样恐惧，故从1967年起，逐渐采取缓和或撤消限制外资的方针。

第三是工人运动问题。垄断资本的迅速增强，对日本工人运动和工会有着强烈的影响。如下一点是资佐证。工会总评议会(简称“总评”)在日本的工人运动中从来都居于主导地位，是全国性工会联合体“政府机关与公共团体工会”的主要支柱，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在主要工业部门里却增加了不属于“总评”的工会组织。1964年设立了国际五金工人联合会日本协议会(简称IMFJC，属于自由国际工人联盟系统)，日本电子机械、汽车、钢铁、造船以及其它有力部门的工会联合体都大举加入了这个组织。IMFJC是排斥政治和阶级斗争，主张劳资调和的组织，因而这个组织受到日本垄断资本的大力支持。从1967年起，可以说日本工人运动的主导力量已由“总评”转移到IMFJC了。与欧美工会组织不同，按不同企业组织起来的日本工会与资本对抗的力量本来就比较

软弱,这样一来,工会对资本的妥协立场更进一步发展了。

第四是农业问题。日本农业是在经济高速增长中遭受的打击最大的部门。在高速增长初期,日本农业便已受到种种影响,从六十年代后半期以来,它所受的打击更加深刻了。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农户数量的变化上。日本农户总数从1950年起便逐渐减少,其中专业农户数量的变化最大。1950年日本专业农户只占农户总数六百万户的50%,到1965年又减少了60%,仅占农户总数的22%。也就是说,到六十年代后半期,专业农户约为1965年农户总数的三分之二,而五年之后,即到1975年,又减为1965年的二分之一左右,在约五百万户的农民中专业农户只占12%。而且从1968年以来,尽管物价不断上升,政府收购大米的价格仍固定不变,从七十年代的前半叶开始又采取了限制大米生产的政策。由于农村的劳动力大部被工业和其它产业所吸收,为弥补人力不足,农业的机械化在这一期间也有了发展。无论如何,由于专业农户急剧减少和非专业农户在农村中所占的比例迅速增加,不得不大量进口粮食,同时又必须限制最主要的粮食即大米的生产。这都说明日本的农业生产实际上已处于崩溃的境地。

关于六十年代后半期日本的出口贸易以及整个经济规模得到极大发展的重要原因,还应特别指出美国在印度支那发动的战争。由于这场战争的深化和失败,美国通货膨胀急剧发展,国际收支恶化,美元危机深化,从而其经济发展停滞,出口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减弱,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下降了。与此相反,日本却由于进行了巨额的设备投资以及生产合理化和劳动强度加强等等,提高了国际竞争力,从而对美国的出口急剧地增加。特别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大量地散发了用作战费和军需的美元,日本立即瞄准这一目标,又向这个地区出口了大量的商品。日本就是这样利用美国的失策而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这一时期日美两国劳动生

产率的增长悬殊很大，1965—1970年间日本平均为14.6%，而美国仅有1.7%的极低的增长。这是日本把自己置于优势地位的有力依据。

4. 高速增长的结果及向低速增长的过渡

在上述状况下，美国政府和垄断资本认为，用一美元兑换三百六十日元的固定汇率，是对日元的实际对外价值评价过低的表现，因而强烈要求日元升值。应当承认，日元汇价在某种程度上偏低，在日美贸易中是有利于日本而不利于美国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急剧增长和发展远远超过了垄断资本自己的预想。正是因为如此，日本的政府首脑和垄断资本的领导人，对日本经济增强的实力没有正确的认识和充分的信心，因而评价较低。因此日本一直拒绝美国提出的日元升值的要求，担心日元升值将使日本降低国际竞争能力，以致减少出口和增加进口。

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新经济政策”，作为美国摆脱困境的措施，其中包括完全废止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止状态的美元对黄金的兑换，实行进口征税和紧急限制进口等政策，要求其它各国改变汇率以对美元升值。此即所谓的美元冲击或尼克松冲击。因为日本政府与日本中央银行同其它各国不一样，它们一直是要求维持日元原来的汇率的，因而感到更加突然。所以日本在此次冲击中所受损害格外严重，一度陷入极其混乱的状态，以致外资大量流入（其中投机的成分很多），出口呈现停顿。在日本国内，由于流入的外资要兑换成巨额日元资金，再加上为缓和美元冲击而扩大信贷，突然间使国内的日元资金大量增加，形成了庞大的过剩游资。与此同时，田中角荣首相又提出了“列岛改造论”，采取了以高速增长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政策。于是以土地、股票以及各种商品为对象的投机活动异常猖獗，通货膨胀猛烈

发展,物价上涨的幅度急剧扩大。

然而,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到1971年下半年的美元冲击以及美国提出停止越南战争并提出预示完全失败的撤退方案为止,已经基本告终。此后的大约二年间是下一个低速增长时期到来前的中间时期。在这时期,日本经济尽管遭到上述各种内外因素的干扰,从表面上看增长率还是比较高的。

5. 石油危机与低速增长的正式到来

在1973年10月爆发第四次中东战争之际,阿拉伯石油输出国采取了大幅度限制石油供应和提高油价的“石油战略”,对多数国家是一次很大的冲击。

日本是极端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所需能源总量的90%依靠进口,其中75%是石油进口,而中东石油又占进口石油的60%。由于日本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极大,“石油战略”对日本的打击较其它国家为大,故称之为“石油冲击”。当时日本各种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囤积居奇的现象盛行,加上“美元冲击”以来的过剩资金仍然存在,所以尽管政府采取了紧急对策,而物价仍然疯狂地上涨,这在日本被称为“狂乱物价”。1974年批发物价指数上升31.3%,零售物价指数上升24.3%,每小时的工资指数上升31.6%,月工资额平均增长26.2%,各种指数都大幅度地上升了,特别是物价和工资的上涨率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是最高的。

因此,在“石油冲击”的袭击下,日本一度陷入极大的混乱。对于这种经济混乱和通货膨胀猛烈发展的局面,日本政府除按不同物资采取紧急措施外,还从财政和金融方面采取了被称为“抑制总需求”的政策,对私人设备投资和建筑投资采取了压缩的措施。于是暴涨的物价逐渐有所缓和,过去一度急剧增加的进口贸易也

从1974年年中开始转变为大幅度增加出口,因而国际收支也趋于改善。经济状况如此混乱,银根稍加收缩,其危机势必深化。正是由于经济混乱和相继而来的深刻危机,1974年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了1.3%,后来政府修改为下降0.5%。不论怎样,在这一年,日本经济出现了战败以来第一次而且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负数增长。

为摆脱这场深刻的危机,日本政府连续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如增加公共投资的财政开支和财政贷款,减税,降低中央银行贴现率等财政、金融以及其它种种“危机对策”。在垄断资本方面,除进行企业的生产合理化外,还采取了裁减工人、临时解雇、加强劳动强度以及废除经营成绩不好和效率不高的部门等新的调整经营的对策,这在日本被称为“减量经营”。这种“减量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所以进入1976年后,出口贸易便由上年的停滞状态转为大幅度地增加(从这年开始到1980年为止,不包括1979年,每年都是以20%至27%的速度增长),一度下降的私人消费也有所恢复。因而景气回升,1976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6.5%。

在石油方面,也不是石油危机初期所畏惧的那样供应不足。实际上,在日本几乎没有发生石油不足的问题。相反地,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发生,石油与其它许多初级产品和原料一样,一时都陷于过剩状态。因此,极其缺乏石油等资源的日本才不致陷入深刻的困境和危机当中。

在爆发石油危机的当时,多数人认为此次日本要遭到最大的打击从而陷入深刻的困境。但实际上日本却较早地从石油冲击的混乱中恢复过来,并度过了所谓的第一次石油危机。

进入1978年前后,原油价格又有提高,特别是1978年12月伊朗事变以后,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的石油价格一再提高。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油价涨幅约为1980年初期的

一倍。此次石油危机对日本的影响虽说也很大，但日本并未因此而发生混乱，没有遭受多大的打击。在这期间，日本经济的增长率持续为5%，仅有极小的变化。但是，从1980年下半年起，经济的增长略有疲弱的倾向。

不管怎么说，当前日本经济确实是降低了增长的速度。日本经济于1975年从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混乱中恢复过来以后，历年的增长率确实都多少高于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然而其增长的幅度也仅止于5—6%而已，与“美元冲击”前的高速增长时期相比下降了一半以上。毫无疑问，日本经济已经进入低速增长时期。

日本经济虽然度过了石油危机，但是日本政府为弥补度过此次危机所增加的财政开支和补充税收的不足，连续发行了大量的国债。结果是财政开支的三分之一以上要用国债来弥补，这是一种多么不健全的状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物价必将猛烈上涨，因而改革赤字财政，使国家的财政恢复正常，成为当前的重大问题。

此外，大幅度增加出口，是近年来经济增长赖以维持的重要支柱，但是最近时期，增加出口已经成为与对方国家不断发生纠纷——所谓多发性的“贸易磨擦”——的原因。这也是最大的后遗症之一。

6. 日本经济地位的上升与贸易磨擦

日本经济变为低速增长已如上述。但是日本经济不论在高速增长时期还是在低速增长时期，它的增长率都高于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也是事实。日本经济从刚刚进入高速增长时期的1960年到进入低速增长时期的1979年的十九年间，国民生产总值（表示一国经济规模的指标）增长了三点六倍，仅次于日本的法国增长了一点三四倍；以下是西德增长了一点零五倍，美国增长零点

九六倍，英国增长零点五七倍。故与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最快，从1960年到1980年的二十年间，日本经济增长了三点八六倍，接近于四倍，年平均增长率为8.2%，其它主要各国都在5%以下。

其结果是日本在所谓自由各国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在1960年约为3%，到1970年则为8%，而1979年又进一步上升到约占10%。以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与美国相比，在1960年约为美国的9%，1970年约为20%，而1979年则约为43%，两者的差距已大大缩小。随着这个变化的发生，人均国民收入的差距也大为缩小，例如1978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约为美国的78%，占美国的四分之三。这些数字表明，在近二十年间，日本经济在国际间的地位显著上升，日美两国经济规模的差距也明显地缩小。日本经济除增长率较高以外，在失业率方面也较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低（1980年日本平均失业率为2%，西德为3.8%，美国为7.1%）。

日本经济在此期间取得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首先应该举出的是发生在近邻的越南战争，它与高速增长时期前夜的朝鲜战争一样，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当时美国不惜一切地向越南派遣大军，结果是一败涂地。这场战争使美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使其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都相对地下降了。而日本却在此时利用战争和美国的过错，赚了一笔大钱，从而得以实现大幅度的经济增长和经济上相对地位的显著提高。

当然，日本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除偶然的国外原因外，还有其他若干主要原因，这就是日本的劳资关系对垄断资本极其有利。与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在日本不仅劳动条件对资本家有利，工资水平特别与美国相比也差距很大。垄断资本还广泛地利用中小企业承受种种形式的负担，利用农业为扩大生产和

流通部门提供庞大的劳动力来源。从经济增长和无限制地扩大利润的需要看,日本的国内市场显得比较狭窄,于是广泛地打入国外市场就成为非常必要的了。垄断资本之间在国内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在国际市场上,这种竞争更为激烈。因此,为加强国际竞争力,垄断资本便在生产和经营上严格实行合理化,努力降低成本,竞相采用新技术和进行技术改良,以致日本引进外国技术之多在世界上居于首位。此外,与经济力量相比,日本的军费负担也较其它主要国家为轻。所有这些,都对日本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从日本经济增长的最大支柱之一的扩大出口来看,在进入高速增长时期的1960年,日本的出口贸易在所谓自由各国的出口总额中只占3.6%,受美元冲击的1971年约占7.6%,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的1975年降为7%,到1978年重新上升为8.2%。

由于日本在世界出口中所占比率的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日本国际地位的提高,日本与各国之间便发生了“贸易磨擦”,特别是与美国之间的磨擦最为严重。

战后初期,随着美国对日占领的结束,日本与美国缔结了安全保障条约,这个条约使日本在军事上迄今一直从属于美国。与此相联系的是,日本在外交和政治上也采取了从属美国的立场。从经济上说,除接受上述各种影响之外,在资本关系、出口市场关系、重要物资的进口依赖关系、国际金融关系等经济方面的关系上,也都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从属美国的地位。但是由于日本经济力量的显著增长,其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从属性,不用说与五十年代相比,即与六十年代的前半期相比,也已大大减弱。在其它方面多少也还能够看到日本对美国的从属性影响。可是,不论这种影响还剩有多少,由于日本经济地位的相对上升和日本商品对美国出口的激增,两国之间的贸易磨擦和经济矛盾还是不可避免的。

在日美两国间,实际上从日本高速增长初期(1960年)开始,

便已发生日本限制从美国进口、美国限制从日本进口的以限制和反限制为中心的斗争。日本政府为保护和扶植国内工业生产，比贸易自由化更重视推迟资本的自由化，对一部分美国大企业进入国内坚决采取阻止或推迟的政策，于是引起了两国间的激烈对立。越南战争时期，日美经济矛盾激化的一个例子，便是1970年日本化纤制品对美国出口激增所引起的“日美纺织品战”。两国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曾一度陷于破裂，到1972年，由于日本方面的让步，谈判才终于达成妥协。同一时期，日本对美国的钢铁出口也受到了限制。

第一次石油危机后，两国间的贸易磨擦进一步扩大，经济矛盾不断深化，例如1977年美国限制日本彩色电视机进口和1978年限制钢铁进口等，就是明证。

但是，日美间的最大贸易磨擦还是日本汽车的对美国出口问题。日本汽车的出口数量从1974年开始已居于世界首位。1980年日本汽车的生产数量为一千一百零四万辆，其中出口占54%，为五百九十六万辆，而对美国出口为二百四十万辆。在美国市场上，日本汽车占汽车销售总数的21%。汽车工业被视为“战略工业”，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特别是美国现在与汽车有关的生产部门的失业人数达八十万或者在此数以上；另一方面，日本汽车工业占制造业生产总额的10%以上，而在出口总额中占21%。正是因为这样，双方对立极其严峻，但结局还是以日本作出一定让步而取得妥协。

可以预计，日美间今后的贸易磨擦还要加剧，此外，日本与欧洲共同体各国间的贸易磨擦也要不断激化。由于最近日本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依靠增加出口，因而如此激化的贸易磨擦以及各国扩大对日本的进口限制，对日本经济来说是极其重大的问题。